

目 录

序	齐世荣	1)
前 言		(1)
第一章 苏俄初创阶段的文化体制(1917— 1920)		(12)
第一节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党对新闻报刊和意识形态的领导		(12)
一、新闻报刊机构的初建		(13)
二、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建立		(16)
第二节 领导文化教育的最高国家机关—教育人民委员部		(18)
一、分权制的设想：国家教育委员会		(18)
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建立及其机构设置		(20)
三、国内战争对文化体制的影响		(23)
四、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首次改组		(28)
第三节 革命初期的社会团体		(30)
一、社会团体的职能		(31)
二、社会团体的概况		(32)
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34)
四、工会和共青团在文化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36)
第二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体制(1921— 1927)		(40)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文化的任务与文化体制		(40)

一、新形势提出的文化任务	(40)
二、新经济政策对文化体制的影响	(42)
第二节 俄共(布)在文化工作上的指导方针以及党	
对文化领导的加强	(44)
一、列宁关于领导文化的指导方针	(45)
二、布哈林、托洛茨基关于领导文化的指导原则	(48)
三、党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导的加强	(52)
四、党内的文化领导机构	(53)
五、党领导文化的方法和形式	(56)
第三节 党和国家在文化问题的争论中领导文化	
的发展	(58)
一、《红色处女地》的创办	(59)
二、“岗位派”及其文学纲领	(60)
三、沃隆斯基和“岗位派”的论战	(64)
四、在解决争论的过程中形成正确决策	(65)
五、科学、民主决策的卓越成果——俄共(布)	
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	(68)
第四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77)
一、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协调	(77)
二、文化教育系统的监督和检查机制	(79)
三、1923—1925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组	(80)
第五节 社会团体在文化体制中的作用	(82)
第三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与文化	
体制的转轨(1928--1932)	(86)
第一节 苏联1928—1929年的政治大论战	(86)
一、政治大论战及其实质	(86)
二、布哈林的理论优势	(90)

三、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动因和条件	(93)
第二节 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的	
“大转变”	(94)
一、酝酿阶段 1928. 4—1929. 11)	(95)
二、发动阶段 (1929.12—1931.9)	(100)
三、完成阶段 1931. 10—1932年底)	(111)
第三节 “大转变”时期文化体制的转轨和变型	(123)
一、“大转变”中形成的领导方法和批判模式	(123)
二、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清洗和改组	(125)
三、科学领导体制的改组	(130)
四、学术文化团体的行政化	(133)
第四章 苏联文化体制的最后形成和确立 (1933—1940)	(135)
第一节 30年代中后期政治思想领域的“大清洗”	
和苏联意识形态模式的形成	(135)
一、政治思想领域的“大清洗”	(136)
二、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确立的标志—《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	(142)
第二节 30年代联共(布)关于文化的理论原则和	
指导方针	(145)
一、对列宁文化革命理论的背离	(145)
二、背弃 20年代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和领导方法	(150)
三、联共(布)30年代的文化方针和政策	(154)
第三节 党内高度集权的文化领导体制的形成	(161)
一、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命制	(161)
二、文化业务部门管理权向党内的转移和集中	(165)
第四节 国家系统文化管理机构的变化	(171)
一、文化管理机构的集中化和专业化	(171)

二、教育人民委员部体制的改组	(175)
第五节 社会团体在苏联文化体制中职能的削弱	(178)
一、学术文化团体的萎缩	(178)
二、社会文化团体的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	(181)
三、工会和共青团在 30年代文化体制中的 职能和作用	(186)
第五章 斯大林后期苏联文化体制的僵化 (1941— 1952)	(190)
第一节 战时和战后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及其 批判运动的再起	(190)
一、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	(190)
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再起	(201)
第二节 党内领导文化的个人权力体制	(207)
一、指导文化的方针政策	(207)
二、领导文化的个人权力机制	(210)
三、党内的文化领导机构	(213)
第三节 国家文化职能机构和社会文化团体的 变化	(216)
一、战时和战后国家对文化的领导	(216)
二、战后社会文化团体的重构	(219)
第六章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文化体制的变革 (1953— 1964)	(222)
第一节 “解冻”思潮及其对苏联意识形态模式的 冲击	(222)
一、“解冻”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222)
二、50—60年代上半期苏联意识形态模式的变化	(236)
第二节 苏共发展文化的思想和政策及教育制度和	

科技体制的变革	(243)
一、苏共在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243)
二、教育制度的改革	(251)
三、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改革	(255)
第三节 党和国家文化领导机构的变革	(259)
一、党的机构的加强	(259)
二、国家文化领导机构的新组合	(262)
第四节 社会团体的复苏	(271)
一、关于国家职能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	(272)
二、“知识”协会的活跃	(274)
第七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体制的凝固和僵化	
(1965— 1982)	(278)
第一节 苏共领导思想的停滞和文化政策的倒退	(278)
一、向传统意识形态模式的后退	(278)
二、僵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285)
三、苏共文化方针政策的倒退	(287)
第二节 党和国家文化领导机构的集中化、	
官僚化和特权化	(295)
一、党内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的变化及	
其权力的高度集中	(295)
二、文化教育和科学管理权力向联盟国家机构的	
进一步转移和集中	(299)
第三节 合法的社会文化团体和非法的	
持不同政见运动	(303)
一、社会文化团体行政化的加强	(303)
二、同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斗争	(305)
结 尾	(311)

参考文献 (332)

后 记 (339)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1917— 1982)

CONTENTS

Preface———— Qi Shirong (1)

Introducti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Chapter I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Soviet Russia(1917— 1920)———— (1)

1 . The Party's Direction to the Press and
Ideology in the Perio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12)

2.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Education—the
Highest State Organ for the Direction to
culture and Education———— (18)

3.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volution———— (30)

Chapter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1921— 1927)———— (40)

1. Task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system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40)
2.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Cultural Work,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Party Leadership to the Cultural Work	(44)
3.	The Party and State's Guid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Process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Cultural Problems	(58)
4.	State Leadership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77)
5.	Fun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ultural System	(82)
Chapter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System(1928-1932)	(86)
1.	The Great Political Polemics in the Soviet Union(1928-1929)	(86)
2.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from the End of 1920s to the Beginning of 1930s	(94)
3.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Change"	(123)
Chapter	The Final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1933-1940)	(135)
1.	The "Great Purge" of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pheres and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Ideological Mod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hirties	(135)
2.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 '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Guiding Rul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	(145)
3. Formation of the Highly-Centralized Leading System of Culture in the Party	(161)
4. Transform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Culture in the Government	(171)
5. Weakening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Function in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178)
Chapter Rigidity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in the Late Stalin Era (1941-1952)	(190)
1.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Ideology in the Wartime and Postwar Period, and Resurgence of the Criticism Movement	(190)
2. The Personal Power-System of Directing of the Cultural Work in the Party	(207)
3.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Orga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	(216)
Chapter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Khrushchev Period (1953-1964)	(222)
1. Trend of Ideological "Thawing" and its Shock on the Soviet Ideological Mode	(222)
2. The CPSU's Guiding Ideology and Policie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Chang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3)
3. Changes of the Party and State's Cultural Leading Organs	(259)

4. Resurgence of the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271)
Chapter	Solidification and Rigidity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Breznev Period (1965—1982) (278)
1. Stagnation of the CPSU's Guiding Ideology and	
Retrogression of the Cultural Policies	(278)
2. Centraliz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Party and State's Leading Power in the	
Cultural Sphere	(295)
3. Legal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Illegal	
Movement of Dissidents	(303)
Conclusion	(311)
Bibliography	(332)
Postscript	(339)

前 言

1991年 12月 25日午夜，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一反往常，以前那种嘹亮动听、悠远浑厚的旋律听不见了，而变得格外凄楚低沉，忧愤痛伤，在几分怅惘中带着无限凄惋和迷离，似乎在嚤嚤地低诉，也仿佛在深长地叹息。

这敲响的是一个曾几何时与美利坚称雄匹敌的世界大国的丧钟！它标志着苏联这个泱泱大国走完了 74年的路程，而宣告了自己历史的终结。

这钟声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挽歌！它标志着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思考，这回忆和思考凝聚到一点 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是怎么结束的 这个跨欧亚大国轰轰烈烈，辉煌煌煌，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震撼人心的壮烈场面，而在其外观尚未显露明显衰颓之际，却突然间忽啦啦如大厦倾，一夜之间崩摧坍塌，旧址上只留下零零落落，一片颓垣。目睹这般景象，世界上一切有头脑的人们都要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近年来，人们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侧重政治方面的，有关于经济、民族、外交的，也有全方位的……这将是一个跨越世纪的研究课题，在几百年间吸引人们的注意。

我们不禁也要发问：苏联近四分之三世纪建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什么也同苏维埃国家机器、社会制度一样嘎然崩毁？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构架和国家机器的一种粘合剂，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铸塑粘合，它没能把这个社会构架和国

家机器凝聚粘合到一起？

探讨这个问题涉及许多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但其关键所在，是一个文化体制问题。说通俗些，就是苏联党和国家是怎么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这个有关领导文化的体制问题，是决定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成败的关键。所谓文化领导体制，就是依据有关文化理论和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通过党和国家一系列决策机制和程序，制定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再经由党和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和社会团体加以贯彻；这一整个体系及其所遵循的法规即称之为文化体制。一定文化体制是一定政治体制的派生物，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为后者所决定，而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文化体制涉及的范围，包括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群众思想教育和党校教育等）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广播、出版事业等各个方面。研究苏联文化体制及其历史变迁的过程，可以从一个特定侧面探讨苏联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从更深的层面上追寻其剧变的原因。

那么，苏联的文化体制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需从人类社会的继承性，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及其传统制度等方面说起。

—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和新旧制度的尖锐斗争中，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而且专注于二者经纬分明的区别和尖锐的对立，而不去注意或者忽略了社会历史长河的贯通和连续性。由旧制度到新制度，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由旧世界到新世界，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急剧的大变动时代，有时由一声炮响，一场革命就可以实现，而新旧历史时代的界限，往往只有一日之隔，比如 1917 年 11 月 7 日之前

就是旧俄时代，而自此日起，就成了新的苏维埃时代。但汹涌澎湃、湍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却不是可以这样分割的。旧社会的泥沙，还会顺流而下；旧世界传统的污垢，还会随沫漂流。这是任凭什么炮声，任凭什么震聋发聩的起义的呐喊声所不能、也无法遏止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要从旧时代跨进新时代；还是这个社会的人，要从旧世界跨进新世界。尽管人们的结合方式在变动，社会地位在变化，但毕竟大体还是原来社会上的那些人：他们还长着原来的脑袋，带着并无多大变化的面孔。仿佛有点像一条河流由一段河床流向另一段河床，尽管湍流速度变了，河床宽窄、堤岸面貌变了，也汇入了新的支流，使河水清浊深浅有所变化，但只要还是上游流下的河水，其携泥带沙的水流还是一如往昔一样。

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发展正像这流淌的河流一样，其继承性和惰性是非常之大的。革命者往往变革之心甚切，总是着眼于变革的一面，而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惰性和继承性，却往往估计不足。

历史文化传统的惰性姑且不说，比较而言，这是较易为人们认识的，而且谈论的也比较多。然而对制度或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新制度和旧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人们以前都这样想，这样说的。是啊，谁能否认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呢？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就制度本身而言（也包括体制），它们之间也有继承性。因为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身也积淀着、包容着社会历史的种种传统和经验。

采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在制定、确立一种新制度时，应该自觉地吸取旧制度的有益的合理成分，同时也自觉地剔除其有害的落后的糟粕；反之，在制定建立新制度时，自以为处处与旧制度相对立，其实，因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必然地会在新制度中掺进旧制度、旧传统的糟粕。

我们检寻、探讨一下苏联的文化体制，恰恰从中可以发现这种旧传统、旧制度中的遗迹。所以，我们在对苏联文化体制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一下这种体制借以产生、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

二

苏联地跨欧亚两洲，占有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半个欧洲和三分之一的亚洲。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它兼有欧洲和亚洲的地缘特征和历史传统。

在历史上，在苏联曾占据的这片辽阔的欧亚大平原上，曾进行过无休无止的征讨和战争。没有天然防御屏障的广漠平原，极易受到东西欧亚两面敌人的侵扰。东方民族的入侵，带来亚细亚的专制和传统，西方民族的入侵，又随之带来了欧洲的习俗和影响。

鞑靼蒙古人在俄国历史上将近 250 年野蛮残暴的专制统治，给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性格和文化传统打上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俄罗斯人隐忍内向、较易顺从的性格就是在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下形成的。因为蒙古人刑罚酷烈，稍有不遵交税、不想纳丁的表示，或稍加不恭或者违逆即会招来横祸或酷刑。久而久之，人们只有苟且隐忍，百依百顺。暗无天日的酷烈暴政，使人萎靡懒散，苟且偷生。今日苟生还不知明天若何？今天有家园、土地、妻子儿女，明天还不知道她们（它们）归己所属否？别林斯基在谈到鞑靼统治造成的后果时，曾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性格作了一番对比。他认为，之所以乌克兰人性格豪爽、外向、开朗，其日常生活更具有人情味和诗情画意，而俄罗斯人内向含蓄，有更多的宗法家长制传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人长期受鞑靼蒙古人统治，而乌克兰一带遭鞑靼奴役较短或根本没受到鞑靼统治所造成。别林斯

基从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中得出的这种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维系民族生存，抵御外来入侵和反抗鞑靼蒙古的残暴统治，俄国人需要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因此渴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一个能够动员人力、物力和一切资源，率军进行御敌的最高统治者。这便养成了他们崇拜皇权和集权制度的传统思想观念。17世纪一位到过俄国的游客曾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什么人比莫斯科人更崇拜他们的大公了，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听到大人教他们崇敬沙皇 就像崇敬上帝一样。”可见 皇权神圣观念对俄罗斯人影响之深。皇权之所以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就是因为它和集权制度、集权国家联系在一起，它能够一言震天下，“一言而兴邦”。

14—16世纪，俄国同鞑靼人近300年的精疲力竭的斗争，使俄国人无暇他顾，完全隔绝于西欧的经济文化发展之外。我们知道 这个历史时期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 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历史转变，工商业在发展，科学技术在勃兴，精神文化正冲破封建神学的束缚，发生着空前的思想解放。而俄国在这个时期却陷入了驱逐鞑靼入侵者的漫长不休的斗争，耗尽了财力和精力，而对于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以及此后西方发生的宗教改革、探险、科学发明等等一系列变化，俄国人却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

后来，沙皇痛感俄国落后，特别是在军事艺术方面。于是在17—18世纪着眼向西方学习，西欧的影响开始进入俄国。但是人们以疑虑重重的目光看待来自西方的一切。俄国当局一方面禁止俄国人出国游历，另一方面又把来自西方的专家隔绝于莫斯科一隅的“外国人公寓”以避免他们玷污东正教的纯洁。这样 墨守陈规的保守主义，就像一堵无形的巨墙，阻隔着西欧的文明。

长期的亚洲式的野蛮统治，造成了沙皇俄国一整套军事封建

主义的统治方式。阿拉克切耶夫在国家机关、军队和农村建立的一套警察专制体制，就是这种军事封建专制主义的集中表现。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军屯制”，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中最残暴的警察制度。所谓军屯，就是把国有农民居住的村庄按军事要求编制起来，使农民变成世代相传的士兵。军屯区农民一边从事生产，保证衣食自给，一边按连营建制，进行军事训练，一言一行必须服从严格的军事纪律。任何人触犯军律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轻者受棍刑，重者遭夹鞭刑。所谓夹鞭刑，正像列·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舞会之后》中所描写的，就是将违纪士兵上身脱光，双手绑在枪托上，由人牵着从两列士兵中间通过，士兵们用通条轮流抽打，违纪士兵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往往当场致死。在19世纪20年代，有遍布许多内地省份的37万余农民被编入这种靠棍棒纪律维系的军屯制。这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变成了一座座军营。为了遏制自由思想，沙皇政府采取了种种反动措施。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甚至任用旧军人为督学，把阿拉克切耶夫体制引进大学，把学校变成军营，还以课程违背基督精神为由，罗织罪名，制造“审判教授案”。为堵塞言路，进一步加强了书报检查制度。到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建立新的警察特务制度，以隶属于“皇帝陛下办公厅”的第三厅，掌管高级警察事务，惩办“国事犯”，监视嫌疑犯，并管监狱事务，还建立宪兵团，作为第三厅的执行机关。第三厅和宪兵团凌驾于政府之上，到处搜捕进步人士。为了防范革命思想的传播，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加强了书报检查和对学校的控制。颁布新的出版检查条例，严禁议论专制政府的活动和发表动摇基督信仰的言论，推行新的学校章程，规定学校“培养教会的忠实儿子，上帝和沙皇的忠实臣民”。鼓吹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三位一体的教育纲领，培养学生笃信东正教和沙皇，反对西方影响。尼古拉一世更加依靠军人贵族维持统治，最重要的大臣职务都由侍从武官担

任。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他的 13 名大臣中，甚至有 10 名是军职人员。据统计，他在位时期，将军在大臣中占 55.5%，在国务会议中占 49%，在参议院中占 30.5%，在省长中占 51.7%。他更进一步把俄国变成了一座兵营，借助于军队、警察和宪兵来维持专制制度的统治。

俄国这种军事封建主义的统治，尽管随着沙皇的更替时张时弛，但直到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一直持续了下来。这种世代绵延的专制统治，使俄国人头脑中、血脉里少有自由民主的传统，而更多专制集权的观念。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虽然一直在欧洲，被称为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就其历史传统而言，更多的却是亚细亚制度的特点。

俄国也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在本世纪初，俄国农民还占全人口的 80%，农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二。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起步较晚，而且受到农奴制残余的羁绊，它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方面造成资产阶级较为软弱，另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在全人口中也只占少数。加上在国内战争时期，大量产业工人走上前线，也因当时经济破坏，一部分工厂倒闭，造成无产阶级失去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人口急剧下降。据统计，在 20 年代初，工厂产业工人的数量同 1917 年相比，减少了两倍多，刚刚超过 100 万。这就使全人口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人口比重上升，使俄国社会淹没到了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汪洋大海之中。

由于农民世代落后的生活条件，而且多少世纪以来都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蛮横统治之下，所以从农民的习性来说，相形于民主的管理方式，还是更习惯于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无论是由农民个人跃升为支配者、统治者，还是农民个人作为被支配、被统治者本身，都脱不开这种传统的社会管理形式（社会生活形式）。

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俄国革命正是在这个实行封建统治的